

■知无不言

世上至难“政府自我调控”

——从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说开去



袁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古典经济学有关土地、劳动与资本的生产三要素学说,不仅古典,而且“今典”。类似“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这样朴实生动而富有哲理的话语,蕴涵的却是真正长久的思想。土地在财富生产与积累过程中的重要性,不是正被当今“新兴加转轨”的中国体现得淋漓尽致吗?

看那些层出不穷的“财富排行榜”中的“先富者”,有多少是以房地产起家的,又有多少人的财富帝国是以房地产为核心利器的,就会明白为什么古典经济学家始终将土地作为第一位的生产要素了。再瞧瞧我们现在的各级地方政府财政,“土地财政”无一例外地成为了鲜明特色。可见,这土地成了极少数“能人”与政府的生财之道与命根子。

然而,土地却成了当前绝大多数城乡普通百姓的生活负担与财富“减压器”。这集中表现在住房价格的快速上升上,其上涨速度远超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住房购买成本极高,与居民平均收入之比也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央政府近年来一再地“宏观调控”,但令人遗憾的是,越“调控”,房价反而越上涨,房地产投资越增长。

何以如此?不妨来分析一下整个房地产的产业链条。在主要的当事人包括农民、村镇行政组织及其当权者、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购房者中,最大获利者是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其次,村镇行政当权者再次,农民与购房者则是利益受损者。其中的表层机理是,住房的主要成本不在地上建筑物而在地皮,对开发商而言的高额地皮成本恰恰是地方政府的巨额土地出让收入,后者垄断了房地产市场上的

土地供给,他们将土地以同出让价格有着天壤之别的极低价从农民手中几近强行征集来;即便是不到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2%的“补偿款”,也绝大部分以各种名目与渠道落入了村镇行政组织及其当权者手中,农民则成了失去土地的“三无人员”,成了这如火如荼的“房地产热”中最大的利益受损者;巨额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与房地产开发商的高额利润,最后由作为城镇普通工薪阶层的购房者支付。

再往深层看,则是现行土地制度使然——我在本专栏中曾通过几篇短文分析过。这一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城镇土地属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不管是谁所有,用于住宅建设的土地必须先经政府集中,通过“招拍挂”等方式出让给开发商,才最终转为建设用地;尤其是农地,不得越过地方政府直接进入市场交易。由此,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一级市场。当供给者只有一个,且供给量有限,加之地方政府“与时俱进”地再“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大肆推行“市场化转让方式”时,这土地拍出让价格还能不被恶炒到天上去?

不知官方数据如何,从媒体报道和大致的测算看,仅2006年多数全国各级政府的“土地收入”就达1万亿元,相当于总计4万亿元“预算内”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根据笔者到一些省市所了解到的情况,这个数字恐怕还是非常保守的估计,一些城市的“土地收入”已近于其“预算内”财政收入的一半。但令人担忧的是,每年不列入正式“预算”的如此巨额“土地收入”是如何花费的?有哪级政府向社会具体公布过?如果再加上同样“属于全民所有却等于没有”的1万亿元“国有企业利润”,2006年



蒋玉磊 制图

至少有2万亿元财富的花费,从没有给过公众一个明确的说法,更谈不上什么社会审议与监督了。反之,如果各级政府对“社会保障”没有足够投入,绝大部分人最关心的“社会保障”仍然陷在“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不起老”的漩涡中,那么,我们离真正的“公共财政”就还遥远。

想想也是,面对如此巨额“土地收入”,地方政府怎么能希望需求端不热烈?怎么希望这房地产价格不上升?又怎么能容忍农村土地未经地方政府“征集转化出让”而直接进入市场交易,并直接在上面盖房出售的所谓“小产权房”呢?于是人们看到了,一些地方政府不仅打着各种幌子,以各种堂而皇之的名义采取多种措施,打击并取缔这种使普通农民与购房者受益的“小产权房”,而且找来各种所谓的理论佐

如果一种制度只是让作为少数强势群体的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一味“大发横财”,而让属于多数的土地真正拥有者与消费者受损,难道还不值得反思?但当前“房地产宏观调控”的真正重中之重是各级政府,而非开发商,更不是购房者。如果不能运用行政手段与法律手段——在政府序列里是没有什么“市场化手段”可言的,将政府在房地产链中的巨大利益纽带斩断,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调控目的”,就难以走出“越调控越涨价”的怪圈。

证何以禁止“农地直接入市”。问题是,如果一种制度只是让作为少数强势群体的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一味“大发横财”,而让属于多数的土地真正拥有者与消费者受损,难道还不值得反思?

由此看来,当前“房地产宏观调控”的真正重中之重是各级政府,而非开发商,更不是购房者;难点也恰恰是“政府的自身调控”。所以,如果不能运用行政手段与法律手段——在政府序列里是没有什么“市场化手段”可言的,将政府在房地产链中的巨大利益纽带斩断,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调控目的”,就难以走出“越调控越涨价”的怪圈。

但是,动不动就“调控”非政府主体与市场而习惯了以自我为基点以他者为客体的政府,突然间要求其“自我调控”,谈何容易?企业管理理论与经验一再证明,“管理者的自我管理”是最难的。但凡是优秀的企业,管理者都是将“自我管理”摆在第一重要的位置,也都是花最多时间并做得最好的。有专家统计,在优秀企业里,管理者一般拿出40%左右的时间与精力“自我管理”。其实,道理也很简单,一个连自己都懒得疏于管理或管理不好的人,怎么能够管理好别人和一个团队呢?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政府的“自我管理”与“宏观调控”。

因此,从当前“房地产宏观调控”的一系列现象剖析中,我们看到,有效的“政府自我调控”是其“宏观调控”有效的前提,更多时候的“宏观调控”其实是“政府自我管理”。

我们热切希望各级政府花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自我管理”。

■乱弹

金融:开放与安全从来矛盾



周洛华

私募基金合伙人

上周我参加了一个有关上海建设金融中心的座谈会。会上的讨论气氛非常热烈,也可以看出大家对于建设金融中心的热情非常高涨,原因在于大家都认识到了,这是上海服务全国的重要举措。但是,就如何建设金融中心,参加会议的各界人士产生了不少分歧。我且将有关争议的内容做一个记录。

金融开放和金融安全

认为金融开放是外国反动势力为颠覆我们红色政权而炮制的一个阴谋的所谓“阴谋论”,眼下似乎在相当一部分领导层中很有市场,一些学者敏锐地领会了这层心思,撰写了许多论述这个观点的文字。对此,我认为,改革开放那么多年了,中国不是更安全了吗?相互有所求,反而真的,真的是幼稚的。在我们这些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进步的同时,那些大胆尝试,锐意进取的改革精神已经被更严谨、更妥善、更稳定的行政规范所取代。

我国金融工作的关键是保持稳定,而保持稳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什么事情也不要在我的任内发生”。我明白了这样的信条和原则之后,那些结构性融资平台等问题的构想统统被咽回去了。

最聪明的人才和最朴素的平台

大家都说建设金融中心需要人才,我却认为我们不缺人才,缺的是体制。诸葛亮算是聪明人了吧?新野出奇兵之时,大家都赞扬他;“诸葛亮,亮也”,仿佛他的智慧是天赐的光芒;挥泪斩马谡之时,大家又纷纷指责他;“诸葛亮,猪(猪)也”,说他笨得像头猪。诸葛亮真可怜,操劳了50多年,又被人议论了2000年。我们建设金融中心可不需要诸葛亮这样的人才,因为我们无法预测他未来的表现究竟是诸葛亮还是诸葛亮。唐太宗有一次评价诸葛亮的時候说,如果他真是一个军事天才,怎么会有空城计那样被动的局面呢?

我们应该更多地依靠制度建设,而不是把金融中心的成败寄托于某些聪明人身上。这个制度应该是由一些朴素的原则,规范而又进取;我们不需要什么花里胡哨的奠基和剪彩仪式来宣布金融中心的成立,我们只要一门心思地加强制度建设,自然而然就会形成新的产业、创新的产品,更广泛的服务全国经济的金融中心就慢慢会实现。

先有政策还是先有服务

参加研讨会的似乎还有政府金融部门的领导,以及其他一些学者,他们的发言始终从一个我以为是令我很难感的角度出发:“为什么这些都是不能做的”。我向往的全过程全对冲的金融机构,向往着多种创新金融产品能得到开发,我向往着

上世纪80年代小平同志刚刚带领我们走进改革开放年代时的那股激情。20多年前的中国,虽然比现在贫穷得多,但是充满了前进向上的激情,那是凤阳小岗村农民的伟大创举,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15年前,小平同志南巡时提出:只要是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只要是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只要是增强综合国力的,什么都可以尝试,什么都可以实验,不论论姓社姓资,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我们今天的有关金融开放的讨论似乎已忘却了小平同志的教导。多数人都从政府如何加强权力和进行方便的监管这两个角度来思考问题:为什么这个新产品是不能开放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事,为什么我们不同意进行这样的改革。

我忽然觉得,在各位领导及他们幕僚深邃的政治智慧面前,自己是孤立的,天真的,真的是幼稚的。在我们这些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进步的同时,那些大胆尝试,锐意进取的改革精神已经被更严谨、更妥善、更稳定的行政规范所取代。

我国金融工作的关键是保持稳定,而保持稳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什么事情也不要在我的任内发生”。我明白了这样的信条和原则之后,那些结构性融资平台等问题的构想统统被咽回去了。

最聪明的人才和最朴素的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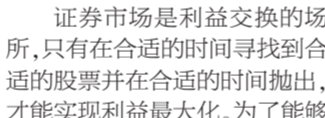
大家都说建设金融中心需要人才,我却认为我们不缺人才,缺的是体制。诸葛亮算是聪明人了吧?新野出奇兵之时,大家都赞扬他;“诸葛亮,亮也”,仿佛他的智慧是天赐的光芒;挥泪斩马谡之时,大家又纷纷指责他;“诸葛亮,猪(猪)也”,说他笨得像头猪。诸葛亮真可怜,操劳了50多年,又被人议论了2000年。我们建设金融中心可不需要诸葛亮这样的人才,因为我们无法预测他未来的表现究竟是诸葛亮还是诸葛亮。唐太宗有一次评价诸葛亮的時候说,如果他真是一个军事天才,怎么会有空城计那样被动的局面呢?

我们应该更多地依靠制度建设,而不是把金融中心的成败寄托于某些聪明人身上。这个制度应该是由一些朴素的原则,规范而又进取;我们不需要什么花里胡哨的奠基和剪彩仪式来宣布金融中心的成立,我们只要一门心思地加强制度建设,自然而然就会形成新的产业、创新的产品,更广泛的服务全国经济的金融中心就慢慢会实现。

■眼观四处

时空统一 系列关系 动态平衡

——新行为金融考察之八



李国旺

资深证券研究人士,专栏作者

证券市场是利益交换的场所,只有在合适的时间寻找合适的股票并在合适的时间抛出,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为了能够寻找好股票,投资者必须要有独特的时空观和方法论去筛选。根据对中国国情的理解和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预测,笔者在此提出筛选股票要树立的三个观点:

首先是时空统一的观点。在证券市场最为宝贵、最有力量的是资金,而是时间。只有时间合适,资金才能发挥作用。时间是证券市场最重要的生产力,时间是金钱的观念在金融市场中体现得最为突出。因为证券市场是建立在一定时空之中的,即使同一股票,时间未到,人心未齐,再多的资金,也无法启动行情,反而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券商在2001年至2005年间出现的风险多数与激进的资产管理业务有关。由于不同的时间关系到不同人气,关系到投资者群体对市场的心态和认识、情绪等因素,研究分析市场和筛选股票,就不能不以当时的时空环境为参考点,以那种时空环境下的人气和政策作为行动的参照点。人气代表投资者群体特别是散户的意志、情绪和行为,是在往往以开户量和交易量来表示,政策代表政府的意志和行为,多数时候以财政和货币量化政策为主,其中也包括制度性利益的调整。

由于自然和社会的交错运动,自然界的一切变化会在一定时间内会通过各种关系传递到社会经济生活中来,时机成熟时,自然变化会以蝴蝶效应的形式放大作用到证券市场上来。因此,自然的变化,在其共性的作用下,如果在某一时点突然作用于市场中的特别股票,行情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近期的食品、能源、金属等股票的表现就是一个例子。

地球万物,都在太阳——月亮——地球三者的关系圈中生长和变化,这种时空结构决定了地球上经济活动必然受到太阳系特别是太阳黑子的周期性活动的影响,太阳地球的对立活

动,60年一个周期,它也决定了经济活动的长周期变化。同时,太阳又有一个11.5年的黑子爆发周期运动,60年周期性活动因此经常会受到干扰。比如,按标准的研究结果,石油化工2004年到达了行业周期峰顶,按这种历时性的线性分析方法,2005年后石油工业股票就会被筛选下来,可是如果放在新的统一时空背景下,在国际范围进行产业视角分析,则2004年后,随着中国石油战略储备的提出,中国因素开始在世界石油市场中被放大,油价在蝴蝶效应和共时性共同作用下被成倍推高,中国石油战略储备计划因此受到延滞。石油是国际战略物资,也是美元背后的“战略”储备,中国要建立石油战略储备,美国在内心肯定老大不情愿,美国通过降息,让美元在全世界出现流动性泛滥,从而不断推高石油价格,逼使人民币升值,将中国出口换取的外汇因人民币升值而形成的财富再次转移出去。因此,中国加入WTO后,时空环境变化了,当前国际垄断资本开始围堵中国经济发展,石油、铜、铝、铁矿石等价格不断上升,出口加工商品价格又不断下降。为了分析和筛选真正的好股票,我们就得重视这种时空变化。如果再加上资源税的推出和出口退税政策因此调整,我们还应及时分析人气与政策变化可能造成的风险和新的机会。

其次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观点。从哲学和物理学看,力是相互作用的一种关系,证券市场的发展就是不同的利益力量相互作用的过程。这种相互作用在一定时空因缘条件下必定产生特定的行情。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到了世界经济体系中,没有行业或者股票可以独立于世界性的经济联系过程。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观点是股票筛选者放下主观偏见,以客观眼光观

察时空变化过程显现的投资机会的过程。

实际上,作用于具体股票的不是一个关系,是系列关系群的集合,某个股票的价格变化是这些关系群相互作用的结果。股价变化的本质,不是买卖决定的,而是具体股票的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若能以相互作用的观点,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找到主线(即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一主线在一定时空点上就是这只股票行情发展的“纲”,纲举目张,找到了具体股票行情发展的“纲”,也就牵到了这支股票行情发展的牛鼻子之绳。

最后是动态平衡而非线性观点。无论是时空环境或者是相互作用的观点,都是建立在发展的动态的前提下,各种作用不断地作用于我们的经济生活之中。比如,近期影响沪深股市的有两大因素:(1)自然因素,即太阳黑子爆发周期继续对农业、气候、生态、心理、情绪的影响,农业进而从物价和情绪上对股市施加影响;(2)经济因素,主要是石油价格的上升和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负面的和正面的相互作用。上述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将使证券市场处于整体上升但不剧烈震荡的状态。仔细分析这些关系,它们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将使不同行业不同个股处于不同的受益和受损状态。

笔者提出相互作用的观点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观点,这种相互作用的目标是和谐,但过程是不平衡的,可能会出现各种风险和机会。比如石油价格上升和人民币升值将通过价格变化使利润在不同行业出现乾坤大挪移,与石油开采和石油替代相关的行业将会大大受益,但用油或石化行业的利润受损失或者受挤压。同样,人民币升值促使人民币资产价格重估,但并不是所有资产价格都受益或者增值。

■新垦地

卡尔扎伊成了自己政策的人质



梁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
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博士
俄罗斯问题独立评论人

韩国全国现在都沉浸在第二名人质被杀的悲痛之中。两名人质的尸体都被找到,这证实塔利班要杀死全部人质的威胁绝非妄言。

在所有韩国人当中,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许是最忧心如焚的。被绑架的23名韩国人既是他的同胞,又是联合国人道主义行动的响应者和参与者,无论于公于私,潘基文都必须竭尽全力化解这次危机,以不辜负当初竞选联合国秘书长成功后舆论一片褒奖之声。但到目前为止,联合国在这件事情上仍然乏善可陈,甚至可以用爱莫能助来形容。这倒并非潘基文无能,而是联合国体制本身所限。潘基文或许拥有全世界最为广泛的关系和资源,但他领导的毕竟只是一个国家间的组织,其所有权力都必须来自主权国家的赋予,即便这样人命攸关的突发事件,秘书长除了发表谴责声明外,实际上很难作出任何的针对性措施。因为这样的措施必须经过各国的漫长协商和讨价还价,其最终决定取决于各国的政治意愿。缺乏一个健全和完善的机制确保维护和援助人员的安全,这是几十年来联合国维和及人道救援工作遭受的最大诟病之处。

首尔当然很清楚潘基文此时的窘境,他们从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了喀布尔的卡尔扎伊政权上。青瓦台已经表示,今年年底将从阿富汗撤出所有军队,因此现在剩下的就是卡尔扎伊是否同意恐怖分子的另一个要求,释放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八名塔利班同伙。韩国政府希望喀布尔在解救人质上能够表现出最大灵活性,并且保证将来会向卡尔扎伊政权提供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但韩国的希望对后者来说似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人质事件持续13天以后,卡尔扎伊政府首次正式表态:“原则上对恐怖分子的任何让步都是在犯错。阿富汗政府坚决反对这样做”,阿富汗政府“希望事件最后有个圆满的结束,并且也会竭尽全力”,但政府“无法对此作出保证”。韩国人显然对此无法满意。据西方媒体的透露,7月29日卡尔扎伊会见韩国高级代表团时,后者向阿富汗人施加了巨大压力;不过但喀布尔本土的消息则称,韩国方面只是准备出巨款赎回这些人质。

卡尔扎伊确实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塔利班要求交换的是关押在喀布尔监狱里的恐怖分子而不是被关塔摩基的恐怖分子,这很清楚地表明塔利班的目标是阿富汗政府本身。责任现在完全落到了卡尔扎伊身上。但假如卡氏答应塔利班的要求,等待着他的将是来自美国 and 北约盟国的强烈批评,甚至有可能结束他的政治生涯。今年3月卡尔扎伊同意塔利班的要求用5名塔利班囚犯交换被绑架的意大利记者后,他已经遭到了西方的指责。华盛顿一名高级官员当时表示,现在“意大利高兴了,记者们也高兴了,但最高兴的是塔利班”。白宫目前的立场仍然是,对于恐怖组织的任何政治要求,都必须采取强硬措施。而这个无政府状态国家的政府,完全依赖于美国的支持,它采取的任何措施都不能不经过白宫的同意。在意大利人质释放后,卡尔扎伊在新闻发布会上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次决定是“一个例外,并且是唯一的一个例外”,阿富汗政府将再也不会对恐怖分子作出任何的让步。

4个月前的这一宣言,让卡尔扎伊现在成了自己政策的人质。韩国媒体已开始质疑阿富汗领导人首鼠两端,在西方人质被劫持后作出让步,在韩国人质被劫后却出于政治考虑不愿让步。从媒体的报道来看,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谈判显然很早就开始,许多阿富汗官员和当地部落领袖都参与了,但是始终没有进展。这自然与卡尔扎伊公开的不妥协政策和美国的压力有关。在谈判期间,半岛电视台曾经援引阿富汗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喀布尔已经同意满足塔利班要求,私下里释放4名塔利班成员。但阿政府高级官员马上否定,并表示政府正在积极准备武力营救计划。美国国务卿中亚和南亚事务特别助理包润石也称,对塔利班“采取军事措施是可能的”,并称军事压力是解决人质事件诸多方案中的一种。

无奈之下,韩国采取了也许是唯一能打开困局的办法:与塔利班直接谈判。8月2日韩国外交代表团已经到达事发省份加兹尼省。韩国方面的报道称,塔利班已经同意与韩国驻阿富汗大使委成祖单独会见,但具体时间和地点还没有决定。塔利班的新闻发言人称,他们现在不再希望通过喀布尔政府与韩国谈判,而是要直接与韩国打交道。因为喀布尔政府在释放塔利班囚犯问题上不够真诚。这名发言人还称,塔利班已经与韩国的外交官包括大使本人通了话,韩国方面表示他们正在同美国协商,以便阿富汗政府同意释放关押的塔利班分子来交换人质。

虽然事件仍处于僵持中,但从最好结果的考虑出发,现实主义应该是唯一的解决之道。目前除了韩国人之外,仍有一名62岁的德国工程师被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劫持,与他一起被劫持的另一名德国人质已经被杀。卡尔扎伊的一名顾问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现在阿富汗政府正处在一个陷阱当中,不管作出什么决定最终都会给政府造成损害。